

中国城市地区社会和政治趋势调查：危机还是稳定？

何增科 编写

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文方在《中国季刊》2001年12月号上发表《邓后时代中国城市地区的社会和政治趋势：危机还是稳定？》文章，考察了中国城市民众对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态度，并比较了邓时代和邓后时代社会舆论的变化。作者进而描述了中国城市地区一般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以及可能的变革力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危机还是稳定？

邓后时代的中国既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又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国要么走向一场危机，要么实现进一步的稳定。

为了明析危机还是稳定，作者通过调查数据考察了危机与含混性的问题。在处理这些数据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取得数据的有关调查情况。

数 据

本研究主要依赖于1999年对中国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和沈阳等6个城市居民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是同北京某高校合作进行的。调查样本建立在一个三阶段抽样调查过程基础之上。最后的样本包括1820个受访者，每个城市有300人。该项调查包括200多个问题，许多问题重复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主持的城市社会调查所提的问题。这些重复的问题对研究过去10到15年中国城市地区社会和政治趋势有帮助。

问 题

为了考察危机和稳定的问题，作者考察了两个直接相关的因素：对经济改革的满意度和对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持度。此外，作者还考察了政治效能感。

改革满意度 改革满意度在1999年的6个城市调查中主要通过下列项目来测量：目前的收入；储蓄和其他财富；住房；个人健康状况；工作机会；言论自由。

政治支持 政治支持的强弱取决于人们是相信危机假设还是相信稳定假设。对现政权的支持在1999年的6个城市调查中可以用一系列问题来衡量，诸如“你对目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是怎么看的？”，为了发现人们对适合中国的最佳政治和经济模式的看法，受访者被要求在一系列国家或地区中作出选择。如果选择中国作为政治或经济发展最佳模式，则表明更加支持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政策。

效能 考察中国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是有益的。如果政治效能感很弱的话，不满意感导致具体行动的可能较小。相反，强烈的效能感可能引发对政府的持续挑战。更重要的是，政治效能感将会导致通过制度渠道的政治参与。

发 现

改革满意度 1999年，最不满意的领域是工作和收入，这反映了由于精简国有企业而加剧的城市失业问题和日益减少的收入机会。同1987年相比较，对改革的总体满意度在1999年下降了。对住房和个人健康状况的满意度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而对言论自由、收入和财富以及工作机会的满意度则明显下降。

日益增加的对改革的不满意也反映了民众对改革速度的态度。在1999年的6个城市调查中有12%的受访者认为改革进展太慢，这是198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与1989年城市抗议期间的水平大体持平。

改革满意度在多变量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考察。“改革太慢”被用来测量对改革的支持。党员对改革比群众更为满意，但对改革的速度表现出暧昧的态度。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加满意却并不认为改革速度太快。受教育程度略微减少了对改革的满意度，但增加了对改革的支持。换言之，受

教育越多的人对改革满意程度越低，因为他们认为改革速度还不够快。

文革前的两代人(1949年前和1949—1965年之间)比起文革中的一代人更加满意，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和政治地位方面是最大的输家。1949年前的那代人、文革中的那代人和文革后的那代人(1977—1984)比起1949—1965以及1984年后这两代人更有可能认为改革速度太快。后两个年龄段的社会群体要么是目前的掌权者和改革的受益者，要么有希望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的未来受益者。

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专业技术人员、私营经济部门、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不满意。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因为改革进展太快而不满意，而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经济部门则因为改革进展不够快而不满意。

简单地讲，危机的假设在经济改革的社会反应方面似乎得到支持。满意度下降了，改革的反对声音增加。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体力劳动者群体、失业者和那些在城市中没有受到中央政府优惠待遇的人群。

政治支持 在1999年的6城市调查中，当问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是否应当改变时，18%的受访者认为应当改变，6%的受访者只想看到较小的变化，31%的人对此不关心，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就行，44%的人不想看到任何变化。可见，大多数民众既不关心也不想要任何变革。当问到是否政治稳定比民主化更为重要时，大多数受访者(58%)同意，26%的人不同意，其余的人(16%)则表示不知道。

以上两个项目同这次调查中的其他6个项目通过要素分析结合起来便形成一个政治保守主义指数。这些额外的项目是：“好政府并不需要选举”；“国家应当约束持不同政见者”；“国家应当决定什么观点能够发表”；“政府应当决定公共事务”；“缺乏社会安定团结会导致混乱”；以及“不支持政府就是不爱国”。

在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中，高收入群体、男性和受过更多教育的受访者较少保守性。改革和改革后这两代人明显地比老一代人更少一些保守性。售货员和服务员、体力劳动者、失业者和退休人员比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白领工人和私营经济部门更加保守。重工业城市沈阳的居民似乎比其他城市居民要更保守一些。这些发现似乎表

明政治保守主义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那些在收入、教育和职业量表上位置较低的人更加保守。

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支持态度通过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考察。当问到哪个国家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最佳模式时，回答是中国自己的体制的占了最高百分比。就像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最大威胁，尽管美国的经济体制被列为中国学习的最佳模式。

对现行体制的态度在同意识形态有关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考察。在那些认为某个意识形态“很重要”的人群中，58%的人选择了实用的邓小平理论，55%的人提到了毛泽东思想，42%和37%的人选择了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只有8%的人认为西方文化将会非常重要。

总体来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阶级取向的意识形态，它似乎吸引了党员、低收入群体、女性、受教育较少者、老年人和具有长期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影响地区的注意力。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道)更有可能为政权的支持者和市场化改革目前或未来的受益者(高收入人群和年轻人)所接受。较少普及的西方文化仅仅为沿海城市居民、年轻人和那些常常反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士所接受。

这些发现似乎并不表明中国城市走向政治危机。城市居民在政治上似乎变得更加保守。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正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以及最近美国间谍飞机事件。较低的社会阶层和较不发达地区的人群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反西方，同时仍然信奉革命的意识形态。

政治效能 最后，通过比较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态度的变化考察了政治效能。总体上看，从1992到1999年政治效能感明显下降。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或社会发展的城市居民寥寥无几。那些认为政府应当决定公共事务的人从1992年到1999年翻了一番。1999年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对生活不满意会向政府申诉，而1992年的数字是24%。

另外，受访者也被问到如果他们在工作中感到上级错了会做些什么。效能水平从1992年到1999年再次下降。1999年有31%的受访者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会服

从上级，而在 1992 年时只有 12% 的人这样说。1992 年有 57% 的受访者说他们将奋起反对自己的上级或其他领导的错误决定，而在 1999 年只有 48% 的人表示将会这样做。1992 年 3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什么也不说但也不会服从上级，而 1999 年只有 21% 的人作出同样的表示。

本节的发现似乎进一步支持了稳定的假设。

结 论

本研究并没有对危机抑或稳定的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没有哪个极端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形势。相反，这些数据同时揭示了两方面的因素并指出了一种多少有些诱人的可能性，即领导层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成功地使不满的公众保持沉默，至少在城市地区进行上述调查时情况是如此。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因为公众疏离的原因就在于对市场化改革政策的不满，而后者构成了邓以后领导权合法性的最重要内容。

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是复杂的。经济满意度不是单纯的，受访者表明在一些领域比在另外一些领域更加乐观。在两个关键的领域即收入和工作机会领域，人们感到 1999 年的情况比 10 年前恶化了，这反映了邓后时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这 10 年间的不同点也出现在对改革速度不满意方面。十年来，不满意度更高了，即使政治形势明显地要稳定得多。1999 年不满意的群体包括体力劳动者、退休人员和失业者。而且，这一趋势很可能还要持续下去，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促使新富阶层和国有部门的输家两极分化。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社会压力，很容易得出邓后中国将走向危机的观点。

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政治的不满意似乎并没有同经济混乱同步发展。这一发现表明政治保守主义正在崛起。到 1999 年时，对中国现行政党制度的支持相对很高。无论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任何其他完整的意识形态似乎都不符合受访者的理想。大多数人，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員和经理人員，似乎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提供经济成果的务实的政府。与作为底线的经济结果相伴而来的是民众的服从和爱国主义的回报。这一回报明显地说服领导人继续沿着邓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只

要他们能够将公众的不满置于控制之下。

同 10 年前相比，明显偏离之处是，1999 年受访者表明对西方的小心提防。他们承认美国的经济成就但并不对西方文化喝彩。受访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水平较低，并且特别将美国看作是一种威胁。然而，受教育程度愈高、年龄愈轻和所在地区经济愈发达的人们亲西方程度愈高。

最后，对于邓以后的领导人来说政治稳定的进一步保证似乎是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中国城市居民不仅显示出对现行政治体制相对有力的支持和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表现出不愿意挑战当局，至少不愿意通过工作场所等制度渠道这样做。

然而，缺乏政治效能并不必然意味着公众满意现状。公众对加快市场改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愤怒可以暂时地被一些重大事件所转移。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日趋下降的公民效能感表明公民对政府不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产生一种挫折感和幻灭感。一旦对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解决问题感到失望，示威和抗议就会成为民众唯一的选择。

因此，这幅图画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认为中国处在危机之中。按照这种观点，危机是由改革推进速度过快、民众难以适应引起的，公众自下而上参与政治过程不受鼓励。这种严厉控制同经济变革的消极反应相结合，将很快引起反弹并可能被转化为对现政权严峻的政治挑战。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也揭示了积极的一面。邓以后的领导人 also 表明他们有能力在某些领域深化改革，同时当他们推动空前严厉的市场改革并在某些领域踩刹车以限制社会动乱的威胁时，他们也能成功地利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诉求。不同于 1989 年，那时领导人内部在政治改革的方法上产生严重分歧，邓以后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公开场合在强调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便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上是一致的。政治上保守的城市人口拥有较低的影响政府的效能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为现任领导人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

(责任编辑 牟建君)